

学科史与学科基本理论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4.04.001

高等教育学知识建构中的互为学科性

——王英杰教授的大学观



阎光才

(华东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要:王英杰教授是比较教育学科的知名学者,但他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也有着广泛与重要的影响。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发展历程的考察,他以比较视角对大学理念展开了长期系统和深入的探究。通过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等案例的细致剖析,他精心刻画了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所具有的个性与共性特征。在他看来,学术神圣是研究型大学的最高信念,是构成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学术治理的核心价值,国际性、公开性、批判性与包容性是具体的价值内涵。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维护学术神圣的制度基础,作为伦理领袖与道德楷模的大学校长的开明领导,体现学术民主的共同治理架构,倡导师生互动与多学科交叉的学术共同体建构,则是研究型大学的组织与制度保障。针对中国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存在的浮躁现象,他提出稳定才是大学的力量,大学的办学行为需要遵循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规律,处理好“不变”与“变”两者之间的关系。稳定或者不变就是“守正”,发展或者说“变”则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如此才能在不忘记根本的前提下,通过自主探索形成各大学自身的个性与特色。在对王英杰教授大学理念的学术观点加以梳理的同时,也以这样一位学科外关键人物为样本,分析其学术关注与高等教育学科相关议题之间存在的智识交流与互动关系,从而揭示高等教育学科与比较教育以及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互为学科性与学科交汇特征。

关键词:大学理念;研究型大学;理念的旅行;高等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4)04000312

修回日期:20240325

作者简介:阎光才,男,山东荣成人,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比较教育和教育社会学研究。

引用格式:阎光才.高等教育学知识建构中的互为学科性:王英杰教授的大学观[J].重庆高教研究,2024,12(4):314.

Citation format:YAN Guangcai.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professor WANG Yingjie's view on universitie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24,12(4):314.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建制性学科的形成,其实都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孕育乃至自然生长过程。只是在特定的时代窗口,一些关键性事件、人物、机构或组织的出现,促成了它的降生。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被纳入学科建制,成为体制认可的学科,就得益于本学科领域众多前辈学者特别是潘懋元先生的筚路蓝缕、开山辟路之功,其成就自不待言,其巨细与脉络已有颇多钩沉。不过,回顾40多年来学科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与其他学科生发与演变轨迹相似,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与知识体系建构,与其说是单纯的内部自我演绎与自我生产,而毋宁说是一个持续开放与不断与其他学科交流互动的过程。尤其是在有关近缘学科如比较教育学和外国教育史等领域,众多关键学者与机构利用其所在学科专长,以国外经典著述的移译、史实挖掘与爬梳以及立足本土问题意识的跨文化探究,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本土生长提供了丰盈的养料。即使在今天,我们深信,几代高等教育学人都从中受益颇多,远有原杭州大学王承绪先生组织的高等教育名著译丛及众多国别研究成果,近有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主持的众多欧美高等教育史译丛与相关著述。对特定学科而言,一些学科外人物或机构由于其身份以及活动域另有所属,即使他们曾经贡献卓著,也往往被忽略甚至成为学科史中的留白。故而,不妨把视角转向外部,对学科外某些关键人物与事件的梳拢,不仅是一种补白,从中或许也能够洞悉学科之间交往互动的机理。众所周知,北京师范大学的王英杰教授是我国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高等教育学科领域也享有很高声誉。本文在此仅结合他关于研究型大学多年研究著述的梳理,围绕大学理念议题,一个可谓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的核心关注,做些材料整理与系统性的学术思想与观念总结,从中或许对于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互为学科性机制可以获得些许启发。

一、案例解析:研究型大学的个性与特色

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高等教育学科在中国的理论及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更具有鲜明的外源性特征。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整个社会文化与环境变迁,促成人们自然把眼光向外,以一种比较视角对有关高等教育基本概念与议题展开思索,如高等学校职能、体制机制与大学理念等。在世纪之交,大学扩招、研究型大学建设、管理体制、大学收费制度、大学素质教育等一系列改革,激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或者大学本质属性即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的探讨,如潘懋元、薛天祥、杨德广、王冀生、张楚廷、眭依凡、陈学飞、龚放、冒荣、邬大光、周川、张应强、别敦荣、刘振天、赵婷婷等大批老中青学者都参与了这场讨论。韩延明、肖海涛还分别以“大学理念探析”“大学的理念”为选题,于1999年和2000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学术年会还以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为大会专题,与会者对大学理念的概念予以辨析,提出“所谓大学理念,就是指人们对于大学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教育思想观念和教育哲学观点”^[1]。其曾经的研究热度,由此可见一斑。

颇值得玩味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王承绪先生主持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开始陆续出版,与大学理念相关的如纽曼、布鲁贝克、弗莱克斯纳等学者的经典著述相继在国内面世,王英杰教授也开启了他此后长达30年对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理念的持续研究。不同于高等教育学科领域人们立足历史与比较研究的哲思风格,也不同于王承绪先生及其团队对经典移译的倚重,王英杰教授更注重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案例透析来诠释研究型大学的理念。或者,我们不妨说,他关于大学理念探析的路径是具象化的,既忠实于史料的真实,又倾向于以生动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这种不预设前提、不着意于一般性与抽象化的概念与范畴界定以及演绎路径,虽然没有明言理念之为何物,但整个文本却处处充盈着何为大学的妙谛。从1993年到2011年近20年间,他以不同的视角切入,分别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研究型机构

的发展历程条分缕析,并在此基础上,以史论结合的方式,阐发了他对于案例大学理念的体悟。

在最早关于哈佛大学的研究中,他考察了哈佛史上3位功勋卓著校长的办学历程:对科学进步极为推崇、富有现代意识与改革精神的艾略特,以选修制确立大学学习自由的原则,奠定了哈佛此后始终作为美国大学改革先锋的地位;劳威尔则持有保守而又现代的自由教育观,他以课程学习的分散与集中,化解专与博之间的矛盾,以住宿制、辅导制和荣誉学位制度的实施,体现他“以秩序平衡自由”的办学理念;富有开放与民主精神的康南特,对大学科研使命青睐有加,强调教师选聘的学术卓越与学生录取选拔的学术标准,并确立了哈佛在普通教育基础上开展专业教育的本科培养模式,其主导的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即使在今天依旧是高等教育史上的丰碑。正是这3位校长,不仅促成了哈佛独有的办学特色,而且为学校注入面向当前与未来、尊重历史而又不为历史牵累的“改革”精神或基因,确立了以领袖与精英培育为使命的办学宗旨。对哈佛的这种精英传统或理念,王英杰教授给予如下理解:“保守和傲慢,又显示出哈佛的进取与创新。在这里,新与旧,传统与创新达到了某种程度完美的和谐和统一。”^[2]

关于耶鲁大学,在其论文标题中,王英杰教授就以“保守性”和“文化品格”两个价值色彩鲜明的语汇,画龙点睛地阐述了耶鲁理念。从创建早期对宗教信仰的守护,到镀金时代对传统道德的坚守,再到现代对“大学共同价值”的捍卫,耶鲁始终以其保守姿态应对环境变迁。因而,耶鲁以不同于哈佛略显激进的态度,总是以慢节奏与谨慎观察的独特方式,塑造了自己极为特殊的品格。这种品格在育人理念上的体现,就是恪守自由教育传统,并将其赋予“国家灵魂不可或缺的价值”;在管理风格上的表现,就是绝不随波逐流,不为外部杂多的功利需求湮没和其他组织逻辑扭曲与颠覆,坚持教授治校,“不畏权势捍卫学术自由”。保守的文化品格不仅没有减损耶鲁的声誉和地位,相反,它自始至终都是盛产美国政界领袖以及文化界与学界精英的摇篮。故王英杰教授把这种品格视为世界一流大学本应具备的品质,它守护、传递并不断创造新的人类文明,以稳定的制度环境呵护师生一心向学,以“渐进与累积的”的改革和“深思熟虑”的行动,履行大学的学术责任与社会使命^[3]。

如果说哈佛与耶鲁是美国殖民地时期创立大学的代表,各自都多少保留有传统精神贵族的气息,那么MIT、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无疑是19世纪下半叶伴随美国经济起飞而崛起的新贵中的代表。在MIT并不悠久的办学历程中,王英杰教授认为,MIT之所以能够称为美国“科学家、工程师与工业家的摇篮”,在于它始终坚持贴合美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国家与工业界科技需求的办学宗旨与理念。在由重技术应用到重科学理论探究、再到科学理论与技术应用结合的发展轨迹中,MIT历史上诸多校长的前瞻视野与战略眼光,塑造了MIT的特色。建校初期的罗杰斯、沃尔克和麦克劳林三任校长,以接力棒交接的方式,持续建构并实现了MIT培养“工业经济领袖的理想”。在三十年代大萧条与二战爆发的特殊时期,康普顿校长与万尼瓦·布什副校长联手,以推动学术性科研、强化基础科学的地位,并利用二战爆发对军事科技有强劲需求的战略窗口,确立了MIT此后扩及全美研究型大学的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借助政府资源提升了大学科研与理工人才培养的实力。二战后的吉利安校长,则从人的尊严、教养与技术伦理角度,倡导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并全力推动MIT综合化,强化了各学科包括文理学科之间的科研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吉利安还鼓励与支持师生参与工业界的技术研发、成果转让与转化,使得MIT成为美国乃至全球工业界的引擎。概括而言,MIT能够迅速成为研究型大学的诀窍,就是有卓越见识与宏大格局、善于审时度势而应变的校长们,始终坚持在理工见长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发展理念^[4]。

与MIT类似,对于同样极具创新品质的斯坦福大学,王英杰教授认为其办学理念就是创建人斯坦福夫妇所提倡的“培养有教养的和有用的公民”。因为这种“有用”思维的渗透,斯坦福大学始终在

科研的有用性与学术性、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传统与创新之间“游走”。而正是在这一系列矛盾冲突中,斯坦福大学形成了不同于东部传统大学的特色。东部传统大学同样追求学术卓越,但它更倡导“独立精神”与“创业精神”;它虽然接纳了东部大学本科自由教育传统,但超越了以往自由教育传统课程与课堂正式化模式,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与智力探索过程中与教师的频繁互动,学会探索与求知,并成为“自由人”;尊重创建人的信念与意愿,但又不受制于其狭隘观念,倡导大学有不同于企业的文化与精神,坚持学术委员会的学术主导原则,坚决维护学术自由。总之,如果说耶鲁的品格更倾向于保守,MIT的风格更倾向于应变,那么斯坦福大学的品性则在上述两者之间。正如王英杰教授所指出的,它更擅长在变与不变之间做出明智选择,并“取得动态平衡”“对于在哪些方面应该与时俱进引领变化、在哪些方面应该坚持传统保持不变做出正确判断,就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获得永生”^[5]。

与斯坦福大学同时期创办的芝加哥大学,王英杰教授称其为“研究型大学中的研究型大学”。他认为,芝加哥大学今日的声誉与地位,源于早期大学校长的智慧尤其是芝加哥校史上两位知名校长哈珀与赫钦斯的治校思想。具有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倾向的哈珀,确立了科研在大学中的首要地位,倡导以原创性研究为大众社会服务,并以个人博大胸怀,精心缔造了芝加哥大学学术自由、异见宽容和思想包容的传统。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赫钦斯校长,尽管其推崇经典巨著的永恒主义主张并没有落地为具体的自由教育课程方案,但他对古典传统的维护、对理性的推崇和对世俗功利的排斥,却成为芝加哥大学至今依存且被珍视的精神遗产。赫钦斯有志于把芝加哥大学建成为学者社区,不畏外部政治恐吓与商业利益诱惑,“理解学者、信任学者”,坚决捍卫学术自由探索的勇气,使得学术成为芝加哥大学“至高无上的使命”,也让其“比其他大学更纯、更真、更具有学术性”^[5]。

至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所19世纪末在西部蛮荒地崛起的州立研究型大学,因为没有宗教信仰与创校者个人观念的羁绊,而矢志不移地追求学术卓越。其在发展历程中,面对的唯一敌手始终是世俗化的议会与外部人士组成的董事会。王英杰教授认为,从成立之初到如今,尽管历经曲折,不断受到外部侵扰与威胁甚至走过弯路,但正是加州宪法赋予的自治地位与加州大学共同治理的核心机构——共同学术评议会,“确保了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的至高无上”。简言之,是机构自治与学术自治的理念及其落实,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现代大学制度确立与研究型大学地位提升奠定了基础^[6]。

以上6所案例大学,可谓办学性质与特色各异,有殖民地时期历史悠久的私立大学,有19世纪下半叶新创的私立、公私混合(MIT系私人创办但接受了赠地款)大学和州立大学,有学科文理综合也有以理工见长的机构,不同机构的发展历程与关键人物的治校风格也各有千秋。因此,其各自的大学理念也自然带有某种独特性乃至个性化色彩。换言之,在王英杰教授的笔下,美国大学理念存在单数与复数的概念,前者体现为个性或特殊性,后者则表现为多样性与差异性。个性塑造了不同大学既相对稳定又存在动态变化的文化与传统,多样性则呈现了美国众多研究型大学立足自主逻辑而演绎生成的景象万千格局。然则,他又认为,个性与多样性却隐含着某些共性或普遍性,甚至正是某些共性才赋予不同大学以个性。

如果将大学理念略作分解,不难发现这些共性:哈佛与耶鲁志在培育社会各领域领袖之才,MIT始终如一培养工业经济领袖的理想追求,斯坦福、芝加哥与伯克利对一流科研与学者的推重,都反映了其追求卓越的共同目标及以才智卓越贡献于社会的使命意识;重视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注重专与博、教养与技术、基础与应用之间的平衡,则体现了其关于人才素养综合化的培养理念;强调共同治理、抵御外部干预和诱惑、维护教师的学术自主地位,则反映了其共同坚守与呵护的学术自由精神与

传统。

二、本质特征:研究型大学理念的共性内涵

如上所述,每个案例都是具体的,其个性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路径都有其特殊性,但它们带有共性的理念则是抽象和一般的。其实,也正因为其抽象,普遍性的理念才为不同机构提供了路引,因而在探索中形成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富有个性特色。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理念,用王英杰教授的说法,“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之间关系的规定,以及内部管理及运转的哲学基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众多高等教育史上先驱如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德国洪堡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早期校长范海斯等,基于大学近千年历史经验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思想总结、凝练与创新。概括而言,在他看来,现代大学理念的几个基本构成部分或者核心成分,就是英国的学院模式,即重教养与精神陶冶的育人理念,倡导教学与科研结合以及教学自由的德国传统,以及美国服务社会的观念^[7]。这些基本理念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反映了现代大学的本质特征,因而也揭示了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规律。

王英杰教授认为,构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探索与发现的无国界性以及面向全人类福祉的世界意识,赋予大学与生俱来的国际性;大学科学研究的无私利性,作为学术社区的大学成员之间思想交流的开放、民主与平等,决策与管理过程的透明化,要求大学有别于其他组织的公开性;坚守相对自主与独立立场,“作为精神文化领域里的一股持久的否定力量”,以理性精神审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观点,不仅是大学创新知识的需要,也是它守护人类精神文明与服务社会的基本品质,因此,大学需要有批判性;批判性需要有宽容,包括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文化、不同背景的学生、不同观念的群体等彼此之间的非一致性,因而体现大学的包容性。王英杰教授把国际性、公开性、批判性与包容性等,既视为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也将其理解为“大学所应共同尊崇的价值”或者理念,而贯穿这些核心价值的精髓就是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7]。

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不仅仅是浸润于西方大学悠久办学历史中的精神理念与文化传统,是新知识与“新思想的催化剂”,更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理念,它使得大学成为知识创新与思想产生的“庇护所”。对外,它厘定了大学与政府以及其他力量之间的法律关系,因而强调中介机构在其中所具有的缓冲作用;对内,则框定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以终身聘任制与教师投诉听证制度等,为教师自主探究与职业安全提供保障^[7]。具体而言,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既是大学制度设计的理念,也是大学制度应然的运行状态,它是一流大学公开性、批判性与包容性等本质特征或价值得以体现的前提,也是大学能够履行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职能与使命的保障。故而,王英杰教授指出:“‘学术自治’是大学制度设计的基础,是处理大学与外界关系的重要准则;‘追求真理’是大学永恒的使命,是大学存在的基本理性,是大学精神的灵魂,更是大学文化的核心,而‘学术自由’是大学追求真理的最基本的制度保证。”^[8]

作为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王英杰教授基于他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全面考察,以及对本土问题的深切体悟,逐渐完成了他自己对研究型大学意象的勾画。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大学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在大学理念与精神上的匮乏。如在“不公平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关系”中“国际性”的处境弱势与左支右绌,“公开性”则过多受到政府政策以及高校内部“长官意志”的掣肘,因为“更重视权威和传统”导致的“批判性”不足,以及受制于社会环境、观念与资源分配机制而缺乏“包容性”,如此等等^[7]。故而,对于具有共性与普遍意义的研究型大学理念,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我们应该“向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学习”,以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为核心价值开展顶层设计,以章程

的制订“明确阐明大学的基本性质、使命和管理架构及程序”,明晰大学师生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为师生发展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9]。

针对近年来国际国内“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的叠加作用”可能对大学带来的负面效应,他再次重申了现代大学所必须坚守的传统与理念:以追求真理作为大学的核心使命,以学术自治保障大学独享的特权,以学术自由呵护大学文化的灵魂,以学者社团奠定大学文化的组织基础。对于学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与管理主义的行政主导逻辑在大学中的全面渗透,他不无忧虑地认为,它们正在侵蚀大学已有且应该永远坚守的传统与价值,包括“利益无涉的研究、对真理的自由追求、信息的自由分享、广阔而平衡的知识追求与传播以及学者社团所包含的价值”,否则大学将面临“失去独立生存的理性”“丧失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大学引领人类文明的灯塔熄灭”的风险^[10]。对于中国大学内部的高度行政化体制——官本位制度,他更表现出一种源于忧患意识的公共关怀与批判勇气,认为它是被几千年历史积郁下来且已经在大学生根的“顽疾”“正在全方位地解构大学,颠覆大学的理念,蚕食大学的学术实力,使大学流于平庸,失去国家创新发动机的地位,难以继续成为引领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的理性灯塔”^[11]。

市场逻辑与行政主导逻辑也瓦解了大学基层组织结构。王英杰教授认为,构成大学基层组织结构的基本依据是学科中心,院系是建立在经过时间检验且相对稳定的知识沉淀基础之上的,它“不会轻易建立,也不会轻易撤销或合并”。学科中心赋予院系以自治地位,也确立了教授治校和院系管理的“民主而非效率”的原则,进而缔造了它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院系文化。院系塑造了师生的学科认同,它也是师生信念与情感归属和“安身立命”之所,因而成为学术自由的基本组织保障。基于市场逻辑与行政主导逻辑的组织变革,它不是以“学术为主导”,以“追求真理为逻辑出发点”,而是带有“问题中心”倾向。一些围绕问题中心的新设研究机构,有明显的功利化与应急取向,缺乏学术研究根基,不仅分散和稀释了资源,伤害了基础学科与基础研究,而且以不当的考核指标与绩效标准,诱导了不良的行为与文化,扭曲了大学的基本使命。为此,他发出情真意切又不乏理性的肺腑之言:“现在大家都在讲‘梦’,那么我也有一个大学梦,就是希望我们今后的大学是能够尊重学术、尊重大学精神和文化,焕发创新精神的大学,或者说,是一所纯净的大学,一所远离了世间纷扰的大学!”^[12] 诚哉斯言!尤其在如今这样一个“改革”方案与手段频仍,而行政与学术、教师与学生关系却日益紧张的浮躁氛围中。

研究型大学的基本使命就是培养好人,推动知识创新与文明进步,并以此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能否履行好这一使命的根本,就在于它是否体现了“学术神圣”的信念与大学的内在逻辑,这可谓是王英杰教授自始至终的思考起点与立场坚守。学术神圣也是大学所有活动包括育人、知识创新、管理与服务的信念基础,是诸如大学公开性、批判性与包容性,学术自主自由和民主平等、人类关怀等理念与价值生成的底色,更是大学组织、人事聘任与考核以及治理结构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如何才能坚守这一万变不离其宗的起点,立足世界研究型大学发展历程的考察,他特别强调作为大学“领袖”的校长角色与作用。在缕析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上众多杰出校长功绩的基础上,他认为校长是大学理念与文化价值的创造者,也是伦理领袖与道德楷模。在一个道德风化面临危机的时代,“大学应该为社会提供榜样”。然而,大学能否成为这种榜样,关键在于校长能否承担其作为“伦理领袖与道德楷模的责任”,即坚持培养学生的“良知”“成为科研伦理的守护者”“把稳舵,让大学成为大学”^[13]。

作为领袖的校长,“把稳舵”就要发挥领导而不是过多纠缠于琐事的管理角色,需要有学术神圣的初心,有长远愿景与战略思维。他是教师的代表,应尊重学术权力,“对大学内不同的文化价值保持真诚的尊重和理解……允许差异存在直至差异不再成为差异”^[14]。他要信任教师并为教师赋

权与服务,以共同价值追求凝聚人心,彰显学术领袖的个人魅力^[15]。显然,在王英杰教授看来,一所大学能否成为大学或者说好大学,与校长的道德、智慧、胸襟、领导力和公信力等个人品质休戚相关。对内,他是学术神圣的坚守与呵护者;对外,他代表了大学的公共形象,维护大学的相对独立性。在如今商业化与官本位潮流中,大学校长如果不能承担逆转这种趋势的领导责任,“大学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15]。因此,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至为关键,应该选择“认识大学本质特征”“熟悉大学、理解大学、致力于实现大学理想”,并以“身为学者、理解学者、信任学者”的人担当大任^[16]。或者不妨说,以我们当下国家与社会极力倡导的角色,大学校长应是有“教育家精神”的学术领袖。

在校长之外,王英杰教授还对大学院系领导——院长的角色,予以界定和抱以期待。他认为,院长固然是大学行政体系中的一环,但他的“主要职责是‘维系学术共同体和人的价值’”。作为“夹缝中的存在”,院长一方面需要尊重规章与程序,履行行政管理者的角色,接受自上而下推动的诸多改革要求。但是,另一方面,他更要尊重与理解教师的诉求与追求,遵循共同治理和学院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成为教师们心目中的“自己人”^[17]。由此不难理解,王英杰教授关于一流大学的学术神圣与学术卓越的理念,其组织领导与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就是他念兹在兹的以学者或教师为本观。没有学者的尊严,就没有学术尊严,更遑论学术神圣。

基于上述理解,简单概括王英杰教授关于研究型大学共同理念的基本构架:学术神圣是最高信念,国际性、公开性、批判性与包容性是其具体的价值内涵,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两大精神支柱和大学运转的“基石”,开明睿智的校长领袖角色和共同治理则是制度基础与组织保障,师生利益维护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则是大学文化营造的核心。

三、本土关怀:研究型大学理念践行的现实条件

尽管作为一名比较教育研究学者,王英杰教授长期聚焦于国际特别是美国一流大学的研究,但是,他的学术关注与问题意识却无一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现实关怀。立足于国际高等教育的考察,他真切地地悟与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以及建设过程的现实条件限制。针对当前国家以及社会各方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急切与冲动心态,他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急功近利与拔苗助长建不成一流,更“不能靠新闻炒作”;仅依赖经费大量的投入也难企及一流,因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在必要的资金投入之外,大学乃至政府更应该通过研究与学习世界一流的经验,实现“制度的改造和观念的更新”^[7]。概言之,理念的认知、观念的自觉与制度的改造要先行,如此,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才可能明确方向,才不至于陷入误区并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对于中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他认为并非简单化的指标比对与追赶。中国的大学不能过度青睐于排行榜与指标体系建构,而是要检视与世界一流大学在理念与制度上的差距,即办学模式是否体现大学的本质特征,也就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模式”。因此,在理念与制度层面,中国大学要研究与总结国际一流大学发展的共性特征或普遍规律,并作为自己的基本遵循。然而,他同时指出:我们还要重视对大学自身文化与特色的研究,不能生硬与强制性地“改变我们的遗传特征”,否则也可能是“非驴非马”的结果。唯有理解普遍规律并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或可探索出“自己的办学道路”^[18]。也就是说,虽然他的研究主要关注域外对象,但又非常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大学自身的研究。

他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优点极为熟稔,更对其现实状态与大学理念——理想大学意象之间出现的偏离保持清醒的认识。故在学习美国研究型大学成功经验的过程中,他主张要有反思性与批判性的立场。如不能学习美国研究型大学普遍存在的“教学与科研分离”“教师与学生分离”倾向,避免其

“重实用轻文化、重个人轻团队、重竞争轻合作倾向”“过分重‘数’而轻‘人’的倾向”,以及大学“企业化”倾向。王英杰教授认为,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也有局限,未必就是“理想的、完美无缺的模式”。在市场化以及新管理主义冲击下,它的某些优秀品质甚至也在发生异变,因而引发美国学术界各方的检讨。他认为,中国大学应该把握好向美国“学什么”与“不学什么”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以我为主的立场。为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特质,他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和谐型大学”理念与模式,即体现“保守与创新”“规模与质量”“教学与科研”“教与学”“学科之间”“学术文化与管理文化”“个人主动精神与团队精神”“放任与问责”等诸多议题与范畴的和谐统一^[9]。“和谐”无疑是一种中国文化精神,它是否可以构成中国大学的特有理念,并赋予中国大学以特色内涵,通过文化塑造与制度设计处理上述不同范畴之间的张力,王英杰教授提出了诸多需要高等教育专业学者与大学领导者亟待深究的议题。他的“和谐型大学”理念与模式,也体现了其思想深处中西两种文化与精神的交融与碰撞,特别是某种难以化解的张力。

例如,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与普遍性本质特征,始终是王英杰教授坚守与呵护的核心理念。但是,他认为,个性中有共性,共性不能湮没特性。因此,他又特别强调中国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必须尊重各自的传统基因与文化遗产。譬如,国际一流大学有综合化的共性,但中国传统上以工科为特色的大学不能一味追求综合化,放弃自己的特色,即使推动综合化,也并非简单的学科与专业设置,而是能否与其他学科如理工之间真正实现交叉和交融,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文化^[18]。因此,立足全球视野以及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体悟,他对现实中的大学改革冲动和盲动又始终持有的一种审慎与警惕。

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因素,他爱恨交加。他认为,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源远流长的精英文化,已经完全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并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这种精英文化传统与精英教育制度“不断相互强化”,成为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与完善“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种社会文化底色中,强势政府、资源依赖、政策的非连贯性特别是“运动式”政策治理,往往冲击了不同类型包括研究型大学特色形成及其稳定性与持久性^[19]。正是基于对中美社会文化与制度之间巨大差异的深切体悟,在对激进改革保持谨慎态度的同时,他尤为强调社会用工制度变革、相关法律完善以及宏观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等。概而言之,作为一位对世界研究型大学了然于胸的学者,他对本土大学发展困境尽管洞若观火且有着切肤之痛,但他依旧强调头脑的理智与行动的理性,希望为现实中的急切躁动注入一针镇静剂。

当然,理智与理性并不是放弃立场,向现实妥协。学术神圣始终是王英杰教授坚守与呵护的大学理念,或者说他从未放弃的信念。无论社会风云变幻与大学的处境如何,他都认为大学的历史使命恒久不变,“大学的力量在于稳定”。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不分国界,都是支撑研究型大学运转的“基石”。因此,任何改革都必须有这份坚守即“守正”。创新则是立足于守正的拓展,这种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就是大学的“渐进和累积的变革”模式^[20]。在所有关于中国大学变革议题上,如大学治理、大学校长遴选、学术共同体建构、学术组织变革、人事聘任与学术评价等,不难发现,他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让中国大学“守正”或者回归大学之道的变革,而绝不是脱离正轨、令人眼花缭乱的频繁“创新”。学术与教师、尊重与信任、共商与和谐始终是他凝神关注的“焦点”,任何与这些焦点的偏离,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创新,反而偏离了大学的正道。

四、时空与边界跨越:理念的旅行

本文撰写的初衷,除了对王英杰教授有关大学理念的学术观点加以梳理与总结,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图:以针对一个学科外关键性人物及其关于特定议题的研究,探求学科交流即互为学科性以及学

科交叉的轨迹。“互为学科性”源于胡鸿保关于社会学与民族学纠缠不清的关系分析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英文对应词可能是 interdisciplinary^[21],但在中文语境中 interdisciplinary 通常被翻译为跨学科性或学科交叉性。就中文释义而言,互为学科性与学科交叉性的语义有所不同,它可作如下理解:尽管两个或多个学科之间可能存在知识边界,却可能仅仅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归属不同而已。然而,在日常正式或非正式的智识性交往与交流中,各自的共同体成员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边界乃至身份归属意识。易言之,互为学科性,意味着不同学科虽有建制,但彼此相互渗透。在硬学科领域,这种现象可能并不十分普遍,譬如即使生物学内部的二级学科如动物学与植物学、物理学的理论物理与凝聚态物理之间,都存在沟通的困难。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多不同的一级学科特别是二级学科之间,如新闻学与传播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

在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大学理念往往被视为一个哲学或文化意义的话题。如潘懋元先生认为:大学理念是一个上位性、综合性的高等教育哲学概念,但它不仅反映高等教育的本质,而且涉及时代、社会、个体诸方面的因素。韩延明则将其理解为人们对那些综合性、多学科、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教育思想观念和教育哲学观点。简单说,大学理念就是关于“大学是什么”“大学做什么”的理性认识^[22]。然而,理解大学是什么或做什么,显然又是一个历史和比较议题,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现代大学具有后发外生性特征的国家而言,纵观与横览,都无法与其他相关学科剥离。

此外,选择王英杰教授为研究对象,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是,笔者与他之间有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交集。200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后,我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投到王英杰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又成为他的同事,长达7年之久,期间,始终以学生身份参加老师的组会。巧合的是,从北太平庄校园蜗居到京师园安家,我都与老师的居所比邻,不足百米之遥,因而有了更多学问求教与私人往来。从20世纪80年代始,王英杰教授先后到哈佛、斯坦福以及意大利和日本众多大学进修、讲学与研究,并曾任澳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他不仅对国际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研究型大学有长期考察、体验和深入研究,而且还有丰富的海内外大学管理经验。正是这些经历,让他体悟到中外大学模式的差异,对大学理念有深切的感悟。他谦和优雅,有君子之风,然而又性情秉直,真诚坦率,公私分明,其为人学为官之风范与口碑,早已为学界周知。始终关心我在上海处境的师母李环教授,在世时曾与我言:“王英杰这人就对自己人最狠,他做外教所所长时,他把我赶到了外办;后来做了副校长,因为分管外事,又逼着我到外汉。”仅此小事,足见其端直。正是有了这种学术生涯中特殊的交集,为我以他这样一位学科外人物为研究对象提供了便利。

苏轼有言,“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自古至今常有“文如其人”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周全。以文识人,应考察其一生之著述,既不可为其一时之作,更不能是单个篇章与局部片段。现实之中,诸多现象固然不能说言不由衷,但随时势变化立场与观点多变者从来不乏其人。然而,王英杰教授的所有著述,其思想、立场与观点可谓始终如一,笔者在此权且冒昧地称其为: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大学文化传统坚守者与捍卫者。这里的理想主义,并非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而是指一种立足于大学本质体悟与理性认知的信念坚守,或者对大学之为大学恒久不变理念的笃信。王英杰教授曾提出一个极为传神的概念——“理念的旅行”。理念的旅行可以指跨越时代的穿梭,也可以指在空间意义上的漫步与穿越,还可以理解为不受学科畛域限制的互为学科性或跨学科交往。

跨越时代的理念旅行,就是他始终坚持的立场:大学由古至今历经数百年积累,经由历史检验而沉淀下来的精神理念与传统,是大学相对稳定的基因。尽管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如大学职能的不

断扩展,但该过程总是缓慢与渐进的。稳定就是大学的力量,切忌冒进与运动式改革。空间意义上的理念旅行,就是立足于不同国家乃至不同研究型大学发展道路的考察,他不否认因应制度、传统与发展基础及条件差异,大学理念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会面临错综复杂的矛盾乃至冲突。但是,环境差异是个性与特色生成、独特发展道路探索的条件,而构成大学共性的本质特征如学术神圣、学术自治与自主、学术共同体等,不会因为空间转换而有质的不同。至于不受学科畛域限制的互为学科性,这是在此需要略微展开的议题。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被纳入建制化而具有学科身份,可谓中国的创举。如前所述,从发生学角度而言,通常一个学科的创设往往是在知识累进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如库恩的常态科学,经历数代甚至数百年无数人的探索而逐渐结构化并自成体系。然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学在1983年纳入建制,则主要得益于潘懋元先生及少数学者等的开创性探究与经年积累。从20世纪50年代厦门大学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完稿,到1984年潘懋元先生主编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再到1993年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创立以及如今学科点林立的格局,我们不妨认为它多少具有“先拿许可再开店”的意味。这当中潘懋元先生作为开创者与设计师的成就厥功至伟,对此郭大光、张应强、李均、胡建华等众多学者已有诸多梳理,在此不复赘述。其实,也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学科发展模式,为学科的生发与早期成长创造了独特的“雨林”生态,她确实有些野蛮生长的无序,却活力四射,生机勃勃。现代高等教育固有的“舶来”特性,以及本土众多领域与议题改革的现实需求,自然调动了学科内外人们对她者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关注,从而使得学科知识生产过程难免带有明显的引进特征。事实上,潘懋元先生也一直非常重视比较研究,他在厦门大学最早创办的期刊就是《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而其他本学科领域的学者无论从事哪方面的选题研究,都多少带有或明或暗的域外视角与理论引进倾向,因而与比较教育学科领域关于高等教育议题的研究,多有交汇与共享,体现了突出的互为学科性特征。

近年来,围绕高等教育学科定位与性质有颇多讨论。关于高等教育学是有别于教育学而可独立设置为一级学科,还是应属于交叉学科,众说纷纭。与此同时,面对其他学科不断地“侵蚀”以及内部出现的“裂变”,学界甚至出现危机论的集体焦虑。客观而言,各种争议乃至危机意识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既缘于该学科获得承认的独特性及其初期野蛮生长的雨林生态,更与潘懋元先生曾长期忧心的现实关注有余而系统性与理论深度(学理探究)不足的某种研究取向存在关联。只不过,雨林生态未见得就是负面的,因为主题即便驳杂多样,只要研究有价值、有可信证据和理论深度,它或许会引发学科边界与身份归属方面的争议,但将其诉诸危机归因则未免言过其实。质言之,系统性的学理研究或者说研究的规范性与理论品质,才是学科得以被认可并摆脱危机的基本条件。

反过来看,其实也恰恰是边界的模糊,且由于有着旺盛的内外政策与实践需求,才造就了高等教育学科初期发展的雨林生态。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内部某些相关学科之间,存在相互嵌套的互为学科性,与其他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生态学、人类学和信息技术等众多学科之间,则有着频繁而并非刻意的交汇。这种似乎有些凌乱的学科生长状态,就是上文关于学科意义上“理念的旅行”的隐喻,即一种与围绕高等教育众多议题的不同学科视角、方法与理论的邂逅。意味深长的是,也正是这种邂逅使得高等教育学在其初创期或发育期,就迅疾遭遇许多传统学科完全不同的处境:如果说传统学科的当下症候是僵化、封闭与自守而亟待开源,那么,高等教育学则是理论与知识疆界还未划定,城门就已经破防。事实上,恐怕也正是这一处境才是人们忧心忡忡的真实原因。

当然,究竟如何看待这种境况,或者说如何理性评价过去40年高等教育学科这种非常规发展轨迹,本文的基本主张为:至少对于部分专业研究者而言,确有必要对过往学科内外有关重要事件与关键人物的著述与思想予以回顾和梳理。回顾不仅是对前辈学术贡献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也是借此

对既有发展过程的反思性审视,更是明确高等教育学科研究对象和问题域、凝练相关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探索理论体系构架的路径。高等教育学要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提升学术品质,以更好地服务于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的决策与实践,坚持更为开放包容的立场是无可回避的路径选择。然而,如何在互为学科性以及众多学科的交叉过程中,实现由知识性的整合即知识体系建构,到相对完整与自洽的理论体系建构的超越,这依旧是学科共同体的使命所在,也是学科奠基者潘懋元先生的夙愿。

回到本文的正题,无论是作为哲学、历史或比较研究的范畴,大学理念话题早已在如今主导性或者流行性的研究风格中被遮蔽。然而,正如王英杰教授所认为的,各种定量指标与排行,未必能够反映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理念与制度才反映了我们是否具有一流的气象。观念、文化以及制度形态难以测度和可视化,置身于其中的每个人却无不有感同身受的切身体验。是理念决定了大学的运行状态与数据呈现的面相,而不是相反,否则,可能是本末倒置,其现实状态与价值预期愈行愈远。因此,在如今有些仓促而又凌乱的节奏中,审时度势,以大学理念为出发点或切入点,重新审视与思考当下诸多高等教育现实难题与困境,应该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学者的理性自觉与学术担当。

总之,从学科史的角度而言,王英杰教授的身份在学科之外,但他的学术思想与成果又在学科之中。他的大学理念或者说大学观,相信会给我们回应上述问题以及关于学科的思考提供启发,而他以及同代众多学者的学术人格与风范更值得学术后辈仰视。当然,在此还需说明,以一位学科外的关键人物研究来回顾高等教育学科史,妥当与否也未可知,权且作为一次涉险的尝试。

参考文献:

- [1] 刘铁.使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2003年学术年会综述[J].高等教育研究,2004(1):105-107.
- [2] 王英杰.大学校长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哈佛大学的经验[J].比较教育研究,1993(5):410.
- [3] 王英杰.论大学的保守性: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J].比较教育研究,2003(3):48.
- [4] 王英杰.大学校长与大学办学方向: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J].比较教育研究,1994(3):47.
- [5] 王英杰.在创新与传统之间:斯坦福大学的发展道路[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8086.
- [6] 王英杰.论共同治理:加州大学(伯克利)创建一流大学之路[J].比较教育研究,2011,33(1):47,13.
- [7] 王英杰.规律与启示: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若干思考[J].比较教育研究,2001(7):48.
- [8] 王英杰.学术神圣:大学制度构建的基石[J].探索与争鸣,2010(3):1314.
- [9] 王英杰.美国研究型大学辨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1):3640.
- [10] 王英杰.大学文化传统的失落: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的叠加作用[J].比较教育研究,2012,34(1):47.
- [11] 王英杰.大学官本位何以久治不愈[J].江苏高教,2015(5):45.
- [12] 王英杰.大学基础组织结构的建构:传统与创新[J].探索与争鸣,2013(6):46.
- [13] 王英杰.大学校长:伦理的领袖,道德的楷模[J].比较教育研究,2013,35(1):47,16.
- [14] 王英杰.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冲突解析:一个文化的视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1):5565,189-190.
- [15] 王英杰.试论大学的领导与管理:孰重孰轻[J].江苏高教,2014(5):44.
- [16] 王英杰.改革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一流大学建设的必要条件[J].科学中国人,2005(5):1617.
- [17] 王英杰.美国大学中的院长:制度、文化和责任[J].比较教育研究,2015,37(2):46.
- [18] 王英杰.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的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5356.
- [19] 王英杰.刍论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建设[J].比较教育研究,2019,41(5):1019.
- [20] 王英杰.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变革:守正与创新[J].探索与争鸣,2017(8):3639.
- [21] 胡鸿保.当前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从学科史和互为学科性角度谈起[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5659.
- [22] 韩延明.理念、教育理念及大学理念探析[J].教育研究,2003,24(9):5056.

(责任编辑:蔡宗模 校对:杨慷慨)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Professor WANG Yingjie's View on Universities

YAN Guangcai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Wang Yingjie is a renowned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but he also has a wid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especially research universities, he has conducted a long-term systematic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of university idea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of cases such as Harvard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he has meticulously depicted the individual an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In his view, academic sanctity is the highest belief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constitutes the core values of talent cultiv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social service, and academic governance, with internationalism, openness, criticalness, and inclusiveness being the specific value connotations. Academic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 are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to safeguard academic sanctity, and the enlightened leadership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as ethical leaders and moral models, the shared governance structure that reflects academic democra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advocating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cross-over, are the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impetuous phenomenon in China's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he proposes that stability is the strength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operation of universities needs to follow the common rule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changing" and "change". Stability or "unchanging" is "upholding righteousness", while development or "change" is innovation based on it, thus forming the individu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university through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without forgetting the basic premise. While clarifying professor WANG Yingjie's academic views on university ideas, also such a key figure outside the discipline was taken as a sample to analyze the intellectu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academic concerns and relevant issues in the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 thus revealing the mutual disciplinary and 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as well as other disciplines.

Key words: university ideas; research universities; journey of ideas;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